

# 农民的贺享雍

□胡平

读贺享雍,主要谈他作品中的土气,土得掉渣的那种气息,这是把他与其他一些乡土作家区别开来的地方。常见的乡土作家,虽然出身农民也写农民,但在价值观和文化意识上是拉开距离的,是以知识分子视角在“观照”农民,如柳青或浩然,你不能说他们还是农民。贺享雍不同,他并未明显改变过农民的立场、视界和趣味,所以我说他是农民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言人。他很难像托尔斯泰那样沉思农民和土地问题(不能说这是他的长处),他的作品里没有概念,少有理性,但充满了毛茸茸的生活,躁动着土生土长的感受和农民的欲望,鲜活而生动,使他的创作别具一格。所以我又说,读他的小说读进去了,你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农民。

写出了《土地神》《村官牛二》等作品后,他又连续写出五部长篇系列小说《乡村志》(是个高产作家),仍然延续着他的风格。第五部《是是非非》写村干部和乡干部斗法,仍以写村官为主,一点事写得风生水起,险象环生,道出了乡村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昏昏晃晃,拉拉杂杂,几位主要人物跃然纸上。

写得最好的是乡里马书记。这位书记是乡镇干部中颇有“门道”的一类,善于在任何形势变化下经营乡财政。农业税免征后,他提出的对策是跑钱争项、招商引资,要每个乡干部先交1万元风险金,每季度至少提供一条可靠的招商信息。他并不关心贺家湾等穷村如何改变面貌,反而在村支书贺端阳面前装穷,收回村里看

管的1500亩林子,搬赶走1000亩中药材基地,又开始提高村民建房的宅基地审批费和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他打了贺家湾旗号,从县里争取来50万元修路费,却将此事一概瞒住,只去贺家湾慰问一番了事,使乡里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乡领导,其实还不过是个普通农民,工作思路和做法仍是农民式的。贺享雍的功劳,就在于把他写实在了,呈现于世人,交世人过目。他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也有自己的语言方式,和村干部说话常是骂骂咧咧,如电话里开口便骂:“贺端阳你干什么去了,啊?大白天的,哪儿和你老婆扯不开了,不接我电话?”——村干部当然也不能吃他这一套。作者以马书记种种举止向读者描绘出一个摸爬滚打在基层的乡级干部形象,具有逼真的生活质感,不由得读者不信。

贺端阳也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村干部,与马书记不同,他保持有农民的朴实和农家的热望,上任后一心想通过修路改变家乡面貌。被马书记耍了以后,矢志不移。他正道走不通,学着走点旁门左道,通过卖树集资,但不由村委会出面,先把树分到各家各户,再由各户分别去卖;为了避过林业检查站,通过私下拉关系通融;得知马书记把县里拨款瞒下后,又组织村民们敲锣打鼓到乡里向马书记送感谢信,使马书记难以抵赖。贺端阳为了做成事,只能以马书记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做法并不光明磊落,“是是非非”并不明朗。但正是在这含糊不清的辨认中,贺享雍写出了农

村基层的某种现实境况,写出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步履艰难。贺享雍的优势就在于颇为了解下层国情,他写小说脑子里没有那么多书生的想象和羁绊,写得很野,不在乎什么规矩,也就写出了种种生态实景,这是读他作品的较大趣味所在。

写了这么多年,贺享雍终于离开乡村场景,让笔下的农民走进了城市。他新近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的《大城小城》标志着他的一次转型。这种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忠实于农民,也就不能不伴着农民的身影行走。

《大城小城》叙述了农民进城后贺家成员的各自经历,结构也开始变得分散。实际上,贺家湾解体了,开篇时李春英做80大寿,家里子孙已无法聚齐,就是一个明显征兆。家里人能进城的都进城了,怀着各自的梦想分别打拼,遭际各异。贺兴琼去当保姆,不得不忍耐老男人的动手动脚;代婷婷到公司求职,被作为礼物送给老板;贺华彦学会了吸毒,被警察关起来;贺华斌读了研究生,却拢不住女朋友;混得最好的是二叔贺兴仁,办起企业,开始包养情人,后来被二奶所骗;他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曾是农民,施工中不惜侵害乡村利益;忘记了自己是儿子,想把老父亲送进养老院。看来,无论是进大城还是进小城,贺家人们都还处于自我迷失状态,成为漂泊的外来人,没有消除农人的印记,又失去一些农人的根本。贺享雍对他们的命运是怀有忧虑的,整部小说里游荡着异化感和不确定感,作品也失去了《乡村



志》里那种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灵活笔触,故事变得支离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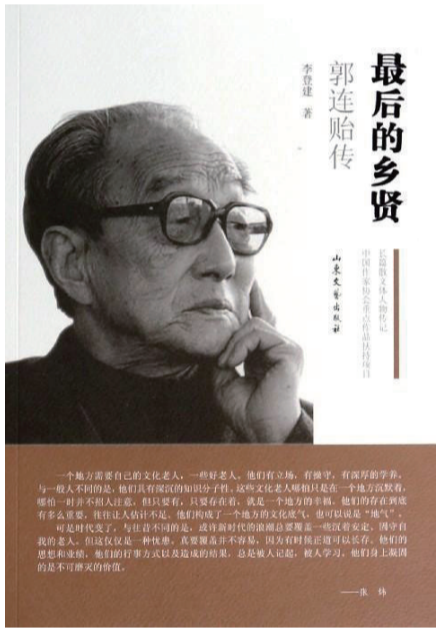
是的,即使在充满是非的《是是非非》里,农民也仍然作为整体存在,依附在祖祖辈辈栖居的土地上。他们有怨言、有不满,也有发泄和排解;他们可以举行村民会议,在会议上提出质疑、取笑干部、拒绝合作,也可以集合起来涌向乡镇,表达集体的意愿。而在城市,他们很快化解了,融化在分不清的街巷之中。

从《是是非非》到《大城小城》,贺享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作为农民作家,他无疑还在持守着写作初心与信念,热爱着他最熟悉亲切的乡间人物,但星移斗转、世事更迭,他也需要重新确定方向,继续写下去,写出柳暗花明。但不管怎么说,他已做到了许多,他的一部部长篇摆在那里,以自己的印象与表达记录了自己亲验的时代。

李登建《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

## 隐于市而显于行

□洪晓萌 房伟



“乡贤”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引擎和传承人,是地域文化的浓缩代表。身处乡野,远离尘嚣,他们有着传统中国文人的清高与儒雅,不落流俗,不阿权贵,隐于市而显于行,将自己一生的智慧、辛劳甚至血泪融进地区的文化脉络中,可敬可歌。但如今,以地方乡贤为代表的古老乡土文化日益被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所吞噬,我们在发掘宣扬前代文化老人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与时代呼应上的捉襟见肘。而李登建这部长篇散文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则为之做了可贵的努力。

李登建是近年来活跃在文坛的一位颇有实力的散文作家,他以怜悯慈悲的情怀关注乡村、关注底层,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的体味与感悟,对命运的思考与追

问,以人道主义精神展现普适性的关怀。在《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中,李登建依然延续了其散文创作的审美风格——首先是家园情结。时代的发展总以遗忘为代价,工具理性、商品价值观不断侵蚀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文人风骨,生存的快节奏与浮躁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当下人归属感与家园情结的缺失,李登建对郭连贻老人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乡贤阶层浓墨重彩地加以塑造,对这一形象的极力推崇,正是作者对故乡自豪感与归属感的心理价值重构。其次是关注人的生存际遇。郭连贻老人的人生是坎坷且传奇的,这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李登建以详实的调查资料与自我感知,细致地叙述了传主的人生经纬,洞察了其一生的屈辱和血泪、沉沦与抗争,性格的裂变与精神价值的重建。有评论家称“这是一部富有入性深度的长篇人物传记”。

李登建在延续了自己惯有的散文审美特征的同时,也对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的书写作了积极的探索,使这部作品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深刻的思想性。如郭连贻一样的文化老人有着深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这是医治浮躁滋生的时代病的一剂良药。作者以郭氏老人为代表,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传达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宣扬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人格力量

和精神操守。传主是一个典型的乡贤形象,作者着力表现了乡贤这一独特的地区文化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乡贤无形中凝聚着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力量,是这个地方的精神文化标识。李登建在此基础上反思那些顶起地区“文化脊梁”的乡贤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寂,古老文明在急速时代变迁中的衰落。这是李登建作为一名担当感强烈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同时又寄予了对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希冀。二是丰富的文化内涵。郭连贻扎根于民间,延展着邹平地区的文化脉络,这种延展是多方面的,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的展示首先得益于作者对大量史料的搜集。郭连贻的一生辗转于几处,资料搜寻整理不易,李登建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对郭连贻老人的经历、个性、内心及其生存的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体验,才塑造出了准确立体的人物形象。可贵的是,李登建对人物形象塑造并不限于历史性的人物经历的梳理,还涉猎了邹平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其如书法和文学的创作发展,儒释道思想在邹平这片土壤中的生发,地域的文化气息与底蕴,文化圈层的构建形成……再者,双线的线索结构。李登建打破了一般人物传记单薄的单线叙述结构,匠心独运地将郭连贻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作为另一条重要线索,融入到人物成长史中,形成了双线

结构,丰满了人物的血肉。两条线索是相辅相成的,人物的生平经历赋予了书法的造詣,书法艺术的进步又彰显了他人格的伟大。在语言运用上,李登建又发挥了散文家的优势。人物传记不同于散文创作,没有既定的感情基调,而是随人物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郭连贻的前半生是郁郁不得志的,作者对他的不幸充满怜悯,行文徐疾得当,疏密有致;政治乌云散去后,郭连贻的文化事业得以发展,李登建的书写便加入了写景状物、抒情议论,整体语言风格质朴却不野,所谓“糈而腴,质而绚”,真诚且庄重,充分显示了这位文字高手的深厚功底。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老人,他们无形中会使地方积聚文化底蕴,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氛围,并将这种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后人。这种力量可能并不为我们所察觉,因为它已然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他们隐于市,看似普通,却有着巨大的精神能源,他们是铸造社会精神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弥足珍贵,每个地方都应积极发掘和宣扬自己生养之乡的文化老人,以昭示地区的文化品格,发扬并繁荣地区文化脉络,达到复兴中国良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淳良精神的目的,不要让他们成为“最后的乡贤”,让古老文明遗失殆尽。李登建正是基于此写出了《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这是对社会的警醒,具有非常的价值和意义。

民间视野,任何武断的评论都可能忽视民间写作对散文创作的可贵探索。打工作家、网络写手的著作有时候更能打动读者的心,他们的作品没有故作高深的炫弄,没有宏大意义的渲染,有着人生的温度与感悟,甚至有着更富有时代感的鲜活的语言。

散文的脾气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没有固定的模式。散文创作一旦形成范式,就意味着需要突破和革新。散文作家应有随着时代而开拓散文疆域、缔造时代语言、丰富散文表达形式的多种尝试。倚仗散文作家的自觉和文学界的共识,散文的新时代特征才会不断被发现。

新媒体时代千万民众的诉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评论家应该正视这种趋向;精英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评论家的视野应该投向更多草根写作者,在通向多元审美的道路上找寻散文创作的多种可能性。散文家的自觉是与读者期待一致的自觉,当下散文需要的是一种宁静的梳理、通达的关照、包容的关怀和更高、更深、更接地气的写作探索。写作者要通过一种思想自觉和创作实践,感受散文随着时代而发生的脾气变化,自觉遵从于这种规律变化,才能有益于散文创作实践,也才能创作出多维度的散文作品来。

# 散文的脾气与作家的自觉

□戴荣里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与传统书写不同的是,这种万众创作的趋势愈演愈烈,每个人都有情感表达的需要,成千上万的微信公众号成为读者们阅读的文化碎片,而在这些文化碎片中,不乏精彩的散文作品。表达的自由和不为写作而撰写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来自于生活本真的语言。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应该说更强大。

到底什么是散文?或者说散文有哪些脾气?可能每个作家的解释都不相同。王宗仁、周涛等军旅作家的散文的雄浑、刘亮程等边疆乡野散文的独特、余秋雨等作家的文化散文的优雅、周晓枫等作家的城市散文个性化特色,祝勇历史散文的厚重,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让传统的散文书写有了多向度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散文的疆域。而互联网的兴起,让散文作者和散文论坛如雨后天春笋般崛起,一大批网络作家最初都是从散文书写开始的。小说家们在长篇创作之余的闲散之作也拥有各类市

场;诗人将诗歌的灵性移植到散文创作之中;而对以散文为主业的报刊界的作家们而言,以石英、梁斌、彭程、刘琼、刘洁等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则呈现着正统旗帜下的转型。这一时期,平民化写作获得丰富发展,一大批作家一方面游弋在散文刊物之中,另有更多的散文作家活跃在网上,并日益转化为散文创作的主力。相对于小说,散文的精致与通达,短平快的特点可以成就写作者的写作风格,散文作者可能缺少诗人高度凝练的功夫,但散文里的诗性则断不可少,散文作家凝神聚理的功效则可兼具小说家的宏大和诗人的凝练。散文似乎是一个包容万物的水缸,可以承载各种写作的转型。散文的多元审美的快捷性,让散文容易同时走进读者的心灵,照亮他们的灵魂。

散文对题材的把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身边的生活,更多的散文作者开始投入到更多题材范围的创作之中。上下五千年、驰骋五大洲,乃至关注地球之外的星体,

都已经成为散文所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作家拥有了散文创作的自觉性,越来越多的散文作品成为摆在读者案头的佳作,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为潜在的散文写作者。在多媒体技术驱动下,朗诵散文、配音散文、视频散文、漫画散文、风景散文等应运而生,丰富着散文的表现手法。散文更多地走进民间大众,读者不只在报刊散文中搜寻散文作品,还可在更直接的手机等新媒体上阅读。散文真正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伴随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散文呈现,促使文学评论家应该关注草根群体的创作,应该关注网络上散文创作的潜在力量,而不是只关注多年耕耘在文坛的老面孔。衡量散文的标尺不能再因袭传统,而要有所创新。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分区域、分行业的阅读才能带来评价的公允性,仅凭几位评论家的阅读或者几个奖项来评价众多散文作品,已经无法涵盖当下的散文创作。当下的散文创作要求评论家富有

乡土作家贺享雍创作目标是十卷本史诗性系列乡土小说“乡村志”,现已出版八卷(卷八《男人档案》,2018年1月出版),加上已经发表的《大城小城》(《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2018年单行本也将出版),已经面世九个长篇。想以十卷本的鸿篇巨制的体量,从农村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等事关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打造成这样一个多卷本乡土小说系列,这在中国现代、当代乡土文学史上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贺享雍在一篇关于“乡村志”的对话中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追求:“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这样的创作意图,显示了作家文学上宏大而美好的理想追求,但能否实现,对于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无疑都是一个重大且严峻的考验。读者和研究者,都会为这样的作家捏把汗,但随着阅读的进行了,所有的担心和疑虑也逐渐消失了。

在贺享雍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柳青及《创业史》的写作成就在当下最好继承和传承。1960年因出版“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柳青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何西来对柳青和《创业史》的评价是中肯的:“《创业史》是柳青小说创作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终结。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20世纪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地位。”

当下乡土小说的产量也可谓丰厚,无论是以贾平凹《极花》为代表、通过带有浓重社会问题性质的事件(拐卖妇女)所书写的“中国最后的农村”,还是像《带灯》等乡土小说所着意体现出的危机感再或者是书写乡村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似乎都与柳青式文学书写——将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有着或多或少显在的差异性。为什么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能很好地继承和传承柳青《创业史》式书写传统?个人的文学造詣之外,对于乡村生活的熟知、身在其中和深入扎根,恐怕是核心和关键的因素。柳青当年就是真正扎根于农民中间,“他不仅在县里有领导职务,而且把自己看作农民中的一员,与他们同甘苦共欢乐。因此,他对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这些史料文献让人看到,一个高级干部宁愿放弃在北京和西安本该享受的优越生活待遇,穿中式对襟的衣服,戴农夫草帽,拄着拐杖,与皇甫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朝夕相处。据说,他的举止言谈和黝黑的面孔,已与当地农民无异。

中国从现代以来,鲁迅等作家涉及乡土的小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一脉,成绩斐然。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多是他们在离开乡土多年以后回望乡土之作。写作中更多启蒙和知识分子立场,小说的隐含作者,在叙事动因方面,更多的是怀着启蒙家乡民众的一种外部观照的视角和眼光。包括当前一些作家写作乡土题材的小说,由于作家本人已经离开乡村多年,素材更多来自社会新闻,或者至少是灵感来自于各种新闻和社会消息。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改写并不成功,原因系对现实的重新叙事化的无力。作家面对的是他们不熟悉的生活,仅凭想象、根据新闻素材闭门造车式地来“虚构”故事,这样的写作,与贺享雍这样实际务农四十载,对乡村的一草一木皆熟悉于心的土生土长的作家写作,还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对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还是对于没有和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和评论者,从贺享雍小说当中,感受到的还是乡村生活的真实。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不似当前有的乡土小说中存在明显的编造和假造乡村生活经验的嫌疑。比如《村医之家》中贺万山从小的成长环境,他如何给村子里的病人看病,他对本土本土生长的那些中草药植物的了解,都不是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所能了解的。《人心不古》中各种乡村生活场景,像佳佳喝农药死后,村主任端阳领着众人料理佳佳后事,化解危机,凡此种种的细节描写,都不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凭想象能够写出来的。现实主义长篇写作,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真实感,离不开细节的文学表达,细节的真实无比重要,它们是写作本身得以确立的根本。

“乡村志”小说的真实感和丰沛的艺术感染力,首先就来自于作家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为此《村医之家》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贺万山)的角度来叙述,至于时常会插入一句类似“大侄儿你说没那,那我接着讲”,可以看到是对古典文学讲述体的一种有意的借鉴,没有比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更能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了。但却明显不同于知识分子精英化叙述那种“自叙传”色彩的叙述方式,其情节和话语叙述的故事性、虚构性,也与非虚构写作拉开了距离。《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是主要人物,小说所写是他和妻子佳兰退休后回村生活的一段经历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但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个回村的贺世普与贺家湾完全不“隔”,虽然在对于法律的理解上,贺世普好像与遵从“救活人不就死人”的贺家湾人,有点“隔”,但通过他的视角所讲述出来的贺家湾的风俗、民情、物事等等,全是带有地域性显著特征的贺家湾的标签印记,不是一个外来者从外部观察的视角,也不是那种那种难以进入乡村内部和细部的叙事眼光和小说叙事方式。围绕老黄葛树所发生的种种故事和细节,乡土气息浓郁,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闯入乡村生活的外来者所能够细细描绘出来的。贺享雍在所有这些小说的细部,显示了他写作的能力和功力。

从语言能力 and 小说技巧方面看,“乡村志”小说也都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下乡土小说写作中,贺享雍的写作让我们重拾对于这种题材创作的信任,重燃我们对乡土文学的希望之光。贺享雍的文学才华,成为他进行乡土小说写作的有效保障。他把四川的方言土语,自然融入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进入小说民俗、民情、物事的描写,但又任由方言的铺排和恣肆。其乡土小说地域性特征显著之余,又不失其“中国性”——他的乡土小说可以让各个地域的中国人读懂和读得津津有味,不存在因方言和地方色彩过重导致的阅读障碍。贺享雍有很强的叙事能力,既具有场景描写的能力,同时又具有对人物心理和言行的精准把握,比如对佳佳和世国冲突的描写——佳佳挨打,佳佳喝农药前的场景和心理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示了作家能够贴着人物细节描写的艺术功力。贺享雍还有很强的景物描写能力,常常是寥寥几笔,略加点染,便能写出乡村风景的诗意,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志”所能够呈现和达致的记录和书写层面。他以真诚的写作态度,良好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才华,让乡土小说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在当下得到了令人欣喜的继承和传承。

## 如何乡村,怎样现实?

□刘艳

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